



典籍分类与学术演进

——论《葆醇堂藏书录》的八分法体系

□胡晨光*

摘要 朱文藻编著的《葆醇堂藏书录》采用“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分法,试图打破四部分类框架。他整合小类设立艺部,把志部、类部、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调整部分二、三级类目的划分、名称和顺序,对类书的性质和丛书的价值做出新认识,反映出以小学、金石学、舆地之学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术风貌。《葆醇堂藏书录》本着灵活变通的编目原则,力求突破四分法的桎梏,在图书分类上体现学术发展,是古籍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积极尝试。

关键词 朱文藻 葆醇堂藏书录 图书分类 八分法

分类号 G257

DOI 10.16603/j.issn1002-1027.2020.02.014

四部分类法自魏晋时期创设,发展至清代,其格局和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私家编目多采四分法。亦有少数学者如孙星衍在《孙氏祠堂书目》等目录中创新体例,其学术价值已得到郑天一等学者的充分阐释^[1]。其实在《孙氏祠堂书目》成书二十年之前,《葆醇堂藏书录》也突破四部的窠臼,试图通过目录分类反映学术的流变,值得关注。

《葆醇堂藏书录》的作者朱文藻(1735—1806),是乾嘉时期的杭州文献学家,字映澹,号朗斋、碧溪居士,他一生未能考取功名,多就馆为幕客,为人考校、编纂典籍。早年间,他就馆于杭郡汪氏振绮堂,著《说文系传考异》,并为汪氏编著提要目录十册——《振绮堂书录》,被称为“讲求目录学者必不可少之书”^[2];也在浙江书局参与纂辑《浙江采集遗书总录》^[3]。后应王杰之邀,赴京助校《四库全书》兼修《续三通》。自京返杭后,朱氏赴山东,替黄易编订《济宁金石志》;后转入阮元幕府,襄助阮元编成《山左金石志》《两浙輶轩录》;再应王昶之聘,编纂《金石萃编》《大藏圣教解题》,今人陈鸿森先生有《朱文藻年谱》述之甚详^[4]。朱氏屡应名公之请,足见其学识为时人所肯定,周春

称他“武林耆旧尽,杭厉一灯留”^[5],胡敬说:“吾浙近代学贍而集钜者推竹垞老人,敬未知先生之学之贍于竹垞何如?而著作等身则相抗。”^[6]

《葆醇堂藏书录》成书于朱文藻赴京校书的后期(1778—1780),是他为王杰葆醇堂藏书编撰的目录^①。今国家图书馆存一刘喜海味经书屋抄本,为《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所影印。是书不分卷,上下两册,无序跋,牌记作“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东武刘氏味经书屋钞本”,目录页自下至上有“刘喜海印”“文正曾孙”“北京图书馆藏”三印,卷端有“燕亭藏书”、鸟虫书“刘”两藏印,卷末有“嘉荫移藏书印”。据《刘喜海年谱》,“道光十年(1830)刘喜海三十八岁时,味经书屋抄成《葆醇堂藏书目》不分卷”^[7]。是书为辑录体,每著录一书,先列书名、卷数,然后注明作者时代、字号、籍贯,并辑录书籍序跋,最后以“文藻案”的形式点评书籍版本、完缺、价值所在等。

朱文藻在助修《四库全书》期间为王杰编订的这部书目不采四部分类法,却用“经、艺、史、志、子、集、类、说”^[8]八分法,并以案语揭示分类之依据,颇具胆

* 胡晨光,ORCID:0000-0003-0061-1461,邮箱:1245644315@qq.com。

① 葆醇堂藏书并非朱文藻所有,国家图书馆影印版前言因袭前人之误,陈鸿森先生在《朱文藻年谱》中已有辨正,不再赘述。见陈鸿森.朱文藻年谱[J].古典文献研究,2016,19(2):198。



识和见地。是书著录典籍约七百余种^①，就其编次的书籍数量而言称不上很多，但朱氏依旧在书目分类中力求创新，部分门类达到三级类目，表明他在长期典籍编目实践中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思考。其分类体系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的基础上，做出不少创新，我们可以透过他所设定的学术框架，窥见典籍分类与学术演进的积极互动。

1 整合小类设立艺部

《葆醇堂藏书记》共分“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部，相对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增加了“艺、志、类、说”四部。

朱文藻别立艺部，置于经部之后、史部之前。艺部之下共分六门，分别是六书、金石法帖、书画、韵书、算书、杂艺。原经部小学类、史部金石类、子部艺术类、术数类等部类被他摘出，形成艺部。就“六书”类而言，朱文藻说：“六书之学，诸家簿录皆列于小学，附经部之末。今别立艺部，则书为六艺之一而作书又必考其原，故以讲六书者冠艺部之首。凡篆、隶、草各体书，亦以此列于后。”^[9]朱氏认为，“书”为古时六艺之一且六书乃造字之法，“作书必考其原”，故将六书列于艺部之首，紧跟在经部之后，一定程度上符合小学之书原附经部之末的学术地位。就“书画”类而言，他说：“诸家簿录以书入小学，附于经；画入杂艺术，附于子。然自来画家往往与书并传，皆为艺苑所重。今故以次列于六书、金石之后。”^[10]该类目收书有《历代名画记》《竹云题跋》等共九种，如《庚子销夏记》，是孙承泽评鹭所见晋唐以来名人书画之所作。朱文藻认为画、书并传，都为艺林推重，因此将书画类列于六书、金石之后。

“韵书”类收书有《佩文韵府》《韵学要指》《古今韵略》《韵府群玉定本》《三体摭韵》共五种。朱文藻案：“音韵本与六书相为表里，而韵书中兼载故实，备词章之用，亦小学之先资也。其《三体摭韵》一书，虽非韵学而与韵府同例，并连类而附于后。”^[11]音韵之书与文字之书同属小学，他将其划入艺部。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常归于类书的《佩文韵府》归于“韵书”类。《佩文韵府》以韵隶字，于每单字之下设四部分内容，首为“释”字，讲音韵字义，可作词典之用；其他部分则供作诗时采择辞藻、寻找典故；总体而言该书确实和小学之书颇有类似之处，而其按韵编排，列入“韵书”未尝不可。“算书”类收书有《孙子算经》《五

曹算经》等四种，他说：“算书向与律术同类，入子部天文家之后。然算，术也。数亦六艺之一，小学余力之所当务也。置于艺部，与书同例。”^[12]他认为算术古为六艺之一，学人治小学有余力当通算术，故不再将其归入子部，提升了算术之学的地位。

艺部以小学为主体，汇集学人治经之余所当学习者。其二级类目中，以六书为首，与之关系紧密的金石、书画、韵书次之，将学人有余力当研习的算书附后，不便归类之书列入杂艺，可见其排序纳入了学术需要的考量，为学人治学提供了借鉴。

2 将志部、类部、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

除增设艺部之外，他还将部分二级类目提升为一级类目。《葆醇堂藏书记》中，志部列于史部之后，分为六门，分别是方輿、通志、府州县、山川、杂志、游记。就各类所收典籍而言，方輿类有《读史方輿纪要》《广輿记》共二种；通志类有《江南通志》《浙江通志》等共七种；府、州、县志类有《邵武府志》《武功县志》等共八种；水道、山川类有《华岳志》《水道提纲》等共十二种；杂志类有《白鹿洞书院志》《月泉杂志》等共六种；游记类共四种^②，分别是《徐霞客游记》《雁岩志游》《游平山堂小记》《衡湘稽古》。以游记类为例，朱氏案语记：“诸家簿录，每以游记入之子部小说家。今以其所记山水名胜，可供地志采撮之用，故附于地志之后。至《衡湘稽古》一书，只载湖南古事，虽未可遽入通志，而亦为作志者所取资，聊附于末以备考。”^[13]他认为，游记之书记载山水名胜，可为方志编纂提供素材，故不再将其划入子部而入志部。朱氏称《徐霞客游记》“走笔为记，如甲乙之簿、丹青之画。其书数万言，皆订补桑《经》《郦》《记》，及汉宋诸儒疏解《禹贡》所未及”^[14]，指出其书在订补《水经注》《禹贡》等古代地理著作方面的重要意义，肯定其地理学价值。他对游记之书价值的肯定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游记类纳入史部地理类的做法具有

① 郑伟章先生在《文献家通考》中统计葆醇堂藏书量为一千余种，根据《葆醇堂藏书记》每部类后所记数量统计，经部为75种，艺部为46种，史部100种，志部39种，子部66种，集部352种，类部17种，说部25种，合计为720种。朱氏可能在统计中稍有误差，已在行文中指出部分讹误，但葆醇堂藏书量应未达到千种之多。见郑伟章. 文献家通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99：419—420。

② 案语称“右游记五种”，实只见四种，未知是朱文藻误记还是抄者遗漏。



内在一致性。

在诸家目录书中,类书往往作为二级类目附于子部。《葆醇堂藏书记》中,类部成为一级类目,不分门,共收《初学记》《蒙求释注》《汉书蒙拾》等十七种类书^①。其中,《汉书蒙拾》“取两《汉书》及《文选》之词句故实可资小学检取者”^[15],摘词列目,后附原文和注解,故朱氏将其列于类书。

小说笔记的阅读是清代文人重要的消遣方式之一,朱氏关注说部之书,他曾纂集《说部杂钞》^[16]。在《葆醇堂藏书记》中,说部成为单独的门类,置于一级类目之末,下设杂说和诗话,收书范围大致相当于四库分类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和集部诗文评类。“杂说”有书十六种,如《太平广记》《孔氏读怨》^②等;“诗话”共九种,如《诗话总龟》《渔洋诗话》等。《汉书·艺文志》已经设“小说家类”,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始设“诗文评类”^[17]。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即把诗话类作品如《后山诗话》《欧公诗话》等收入“小说家类”之中。朱文藻将叙述杂事、记录异文、缀辑琐语的小说家之书和评论诗文的诗话著作合为一类,应该和他对诗话体裁的作品性质认识有关系,他的《碧溪诗话》就有很强烈的记载学人奇闻轶事的特点^③,反而少了评论诗文的色彩。

就书籍数量而言,志部有书39种,类部有书17种,说部有25种,其数量尚不能满足一级类目的创设。但朱氏将志部、类部和说部从原史部、子部和集部中抽出,提升为一级类目,是出于对清代学术风尚的把握和对地理著作、类书和说部之书价值的再认识。与此相比,成书略晚的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设立“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金石、类书、词赋、书画、说部”^[18]等共十二个门类,也将类书、地理、说部之书列为一级类目,这说明乾嘉学者对这类的书籍和学术的认识存在共通之处。

3 调整二、三级类目的划分、命名和排序

在增设艺、志、类、说四部之外,朱氏对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之下的二、三级类目也有调整,在书籍类目的划分、命名、排序之间,可见朱氏对书籍和学术的认识。

《葆醇堂藏书记》经部分七门,分别是易、书、诗、春秋、三礼、四书、群经。朱文藻将小学类划入“艺部”,并因王杰家藏之有无,而未设“乐类”“孝经类”,这对于完整的目录分类体系而言,实在是一个缺憾。

经部中“群经”类所收书有《内府校刊篆书群经》《十三经类纂》等,“群经”类采兼括诸经之义,命名同于《经义考》和《明史·艺文志》,与《四库全书总目》所立“五经总义类”不同。《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指出:“兼诂群经者,《唐志》题曰‘经解’,则不见其为群经;朱彝尊《经义考》题曰‘群经’,又不见其为经解;徐乾学通志堂所刻改名曰‘总经解’,何焯又讥其为杜撰。今取《隋志》之文,名之曰‘五经总义’。凡此之类,皆务求典据,非事更张。”^[19]指出“群经”之名“不见为经解”的不足,故沿《隋书·经籍志》之旧,仍以“五经总义”命名,但亦有不能涵盖诸经的缺憾,不能反映经学的发展。

《葆醇堂藏书记》史部分为九门,分别是正史、别史、史钞、史通、纲鉴、典要、传记、谱牒、簿录。就史部“典要”类而言,朱文藻案语记:“典要者,朝廷之大典大要也。诸家簿录史部有故事一门,所载颇亦类此。然故事所该,颇近琐屑。兹所录者,皆关系政令之大,非类编细事者比。故以‘典要’二字,创为标类。简首恭载钦定诸书,间有诸臣所纂,亦依类附焉。其前代及本朝诸儒著述统纪历代典故者,并总附于后。”^[20]以往的目录书中,《七录·纪传录》设旧事部,《隋书·经籍志》史部、《古今书录》乙部史录设“旧事”,《新唐书·艺文志》乙部史录设“故事类”,《遂初堂书目》史部设“故事类”“本朝故事”,《直斋书录解題》史部设“典故类”,《文献通考·经籍考》设“故事”,《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史部设“故事类”,即朱氏所云“诸家簿录有故事一门”。朱文藻以“典要”代“故事”,收大典大要之书,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政书类”在创设内涵上存在一致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政书类”下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小类,收典章制度之书;《葆醇堂藏书记》的史部“典要类”所收书则有《庭训格言》《朱批谕旨》等皇帝训诫之书,还有《三通》《册府元龟》《玉海》等书。《册府元龟》《玉海》二书通常隶于类书,此处置于史部“典要类”,别有深意,当

① 类部末案:“右类书十六种。”核其数量,实共十七种。(清)朱文藻.葆醇堂藏书记[G]//陈红彦.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志丛刊:第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241.

② 其中有《谈艺录》一书,为明代徐祜卿所撰,是为诗话著作之大成,似归入诗话一类更为恰当。

③ 如他在《碧溪诗话》的小传中对齐召南、丁传、汪士桂等怪谈轶事的记载,同类记载俯拾即是。



是出于对类书性质的再思考。

《葆醇堂藏书记》子部分为儒家、杂家、释家、道家、诸家。子部杂家类，朱文藻案：“杂家之例有二，有学术不醇、习于杂霸者，有长于考古、不专二家者。观汉隋与唐宋诸史志，门类分合之迹判然，自唐宋以来相沿已久，率以考古之书为杂家，今从之。又史志之例，儒家之后次以道家。今以杂家之书为学人考订之用，与儒相近，彼二氏者非吾儒所尚。故儒家之后，即次以杂家，而道家则改列杂家之后焉。”^[21]朱文藻以学人治学的实际需要，在目录书中将杂家所处位置的顺序前调，使儒家与杂家两类有助于考订之书次序相接，反映出他在书籍分类中对学术实用的注重。这一做法，同朱文藻参与编纂的《浙江采集遗书总录》的处理方式一致^[22]。

将杂家列于儒家之后，他又将佛家提于道家之前，他说：“唐宋史志，皆以释家附于道家之后。彼时尊崇道教，次叙宜然。然佛老之称，其来久矣。先佛后老，匪自今兹。似不必沿袭旧例也。”^[23]清代尤其是乾隆年间，佛道兴盛状况与唐宋时已有差异，因此朱氏在图书目录中将佛家提前，道家附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释家类序言云：“诸志皆道先于释，然《魏书》已称《释老志》，《七录》旧目载于释道宣《广宏明集》者，亦释先于道，故今所叙录，以释家居前焉。”^[24]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先释后道的做法可能和政治因素相关，同时期的书目如范邦甸《天一阁书目》^[25]、钱大昕《元史艺文志》^[26]等均沿用了先释后道的模式。朱氏区分了古道家和后世道教之书，他说：“古之所谓道家，其言本有关于治道，非如后世杂以神仙导引之说也。老子之谓道家，义本如此。”^[27]他在参与校订《续通典》时也指出：“唐时尊老子为圣祖，称之为太上元之皇帝，其礼尊崇，故杜《典》序次在孔子祠之前。杜氏生于当代，著书立例不得不尔，然出于一时，不经之典，不可为后世法也。”^[28]试图在目录编制和书籍体例中反映道家的衰落。释道两家之后，朱氏设诸家类，下分阴阳家、农家、形家、医家四个三级类目。初看之下，诸家类似有与一级类目的名称有叠床架屋之嫌，实际上，这是考虑了书籍数量之后灵活变通的结果。诸家之下的四个三级类目仅有书共九种，故在书目分类中由第二级降为三级。

《葆醇堂藏书记》集部分为三门：别集、总集、丛书。别集下设“历代诸家别集”“方外别集”“闺秀别

集”三小类，“凡百四十四种”^[29]，以“历代诸家别集”数量最多，他说：“别集各种，皆就插架所有，悉为录出，不加抉择。夫文人积一生精力成此诗文，舍此别无表见。虽零篇散佚，未必确有可传；然未尝不藉著录家标其姓氏，垂之久远，则于去取格律，似可不必过严。自昔如晁氏《读书志》，陈氏《解题》，当时或亦漫尔入录，至今遂成不刊之书。今之所收，亦仿其意，未始无裨于作者之苦心也。”^[30]朱氏深知将诸书列入目录记载能够促进典籍流传，使之“垂之久远”，故仿《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之意，在编辑书目时特意留心，一一采录历代诸家别集。此外，《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云“释道、闺阁，亦各从时代，不复区分”，暗指僧道、女性著述不宜与士大夫著述同列。《葆醇堂藏书记》显得更为直白，在分类中特设类目，以示区别，“别集”类中，设立“方外别集”，收僧人诗文，仅有《筠溪牧潜集》和《英虚大师遗集》二种^[31]；设立“闺秀别集”，收女性著作，只有《绣佛斋草》和《红余小草》两种书^[32]。

4 重新认识类书的性质和丛书的价值

朱氏在《葆醇堂藏书记》中将《佩文韵府》列入艺部“韵书”类，将《册府元龟》列入史部“典要”类，《太平广记》入说部“杂说”类，与诸家目录有所不同。可见朱文藻在书录中对类书的归属，不独从编纂体例切入，而是综合考量了典籍内容、材料取资和学术利用等多方面因素，颇有独到之处。《四库全书总目》称《太平广记》“古来轶闻琐事、僻笈遗文咸在焉，卷帙轻者往往全部收入，盖小说家之渊海也。”^[33]部分书目如《世善堂藏书目录》《季沧苇藏书目》等将《太平广记》归入子部类书，未能反映其小说总集的典籍性质。朱文藻与《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的处理方式一样，将其书归入杂说类，他在叙录中说：“《太平广记》，宋李昉等编辑。太平兴国间，既得诸国图籍，而降王诸臣皆海内名士，或宣怨言。尽收用之，置之馆阁，厚其廩饩，使修群书……又以野史、传记、小说诸家，编成五百卷，分五十五部，赐名《太平广记》。”^[34]该提要分析了《太平广记》的创作原因及材料来源，因其多采自“野史传记小说”，故将其归入杂说类。

此外，朱文藻认为，《册府元龟》《玉海》多记载朝廷典故，因此应列于史部典要类，而不再将其归于子部类书类，他说：“右《三通》《元龟》《玉海》，文藻案：



诸书向入子部类事一门,今以其所载多纪朝廷典故,足资史志考校之助,非类书之仅供词章采撮者,故列于此。”^[35]《三通》置于“典故”类固然,但对《册府元龟》《玉海》两部书的归属,朱文藻的分类同许多学者不同。《册府元龟》为辑佚《旧五代史》的重要参考,史料价值很高。周春云“先兄向辑《旧五代史钞》六卷,邵二云留心此书,实自先兄发之,其时未知《永乐大典》中所有也”^[36],另外,朱文藻还曾作《五代史纪事》^[37],在助修《续三通》时也多考校五代史事^[38],以五代史、宋史研究见长,或可推测,朱氏对《册府元龟》的重视可能出自他认识到该书在五代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黄永年先生在《古文献学讲义》目录学部分将《册府元龟》放在史部政书类,他说:“还有一部大书,过去多把它放在类书里的,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也就附在会要一项来讲。这就是:《册府元龟》……有价值的是唐五代部分,多取实录、国史及唐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颇有不见于两《唐书》、两《五代史》及《通典》《唐会要》等书者,堪称第一手史料而为研究者重视。”^[39]对此,辛德勇评论说:“书籍的类别归属,是对于书籍基本内容和性质的认识。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册府元龟》。传统目录一向著录此书于类书当中,有人还把它与《太平御览》等并列为宋代‘四大类书’。黄永年先生认为它‘其实体制以及今天的用途都和会要相同’,因此便把它列在史部政书类。《册府元龟》自是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特别是唐代历史的重要资料,其价值不在《唐会要》及《通典》诸书之下,体例与分类编制政事的会要相同,而与采摘旧事轶闻辞章以供寻章摘句的类书却有很大差别。”^[40]虽然以为《册府元龟》价值不在《唐会要》《通典》等书之下的看法乃见仁见智之说,但据以上两位先生的分析,将《册府元龟》从类书中摘出而置于史部典要类的做法是有其合理性的。此外,朱氏将《玉海》置于典要类而不归于类书,同样是出于对《玉海》在记载历代典制和本朝掌故方面价值的考量。

在集部的别集和总集之后,朱文藻别设丛书一类,收《汉魏丛书》《汉魏丛书抄》《津逮秘书》《知不足斋丛书》等十二种书。朱文藻案:“诸家簿录,向无丛书之目。今创立类例,缀于集部之末。盖‘丛’与‘集’义本相同,合一人之作兼数种者,谓之‘集’;合数十百人之作兼数十百种者,谓之‘丛’,亦可谓之

‘集’也。”^[41]朱文藻认为以往诸家目录著作中未把丛书单独类目,他创立丛书类,并认为“丛”“集”字义本相同,可以通用。

朱文藻对丛书的看法另见于《知不足斋丛书》序言,他说:“丛书之名,何所昉乎?昌黎诗云‘门以两版,丛书其间’,犹丛积之义也。其萃群书而汇为一编,前明始有《汉魏丛书》《唐宋丛书》《格致丛书》诸刻。至国朝而新安张氏、钱塘王氏,以及棟亭、雅雨诸家,搜奇集胜,流播艺林者,遂指不胜曲。而唐陆天随自名其诗文曰《笠泽丛书》,其实权輿也^①。天随之言曰:‘丛书者,丛脞之书也。丛脞,犹细碎也,细而不遗大,可知其所容矣。’儒者研穷经史,以探其源,而又必泛滥乎诸子百家之书,以竟其流。”^[42]一般认为,最早的综合性丛书出现在南宋,以《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书为代表。到明代时,开始正式把“丛书”作为丛书书名的一部分。就著录而言,明代万历年间《澹生堂书目》将丛书设在子部之末,被视为丛书类在目录著作中立类之始^[43]。《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都未设“丛书”二级类目,《明史·艺文志》将其附于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归于子部“杂家类”。朱文藻在忽略《澹生堂书目》有丛书类目的情况下,认为“诸家簿录,向无丛书之目”,在集部下创设“丛书类”,且他依据“丛”“集”字义相近,将丛书置于集部,似较以往置于子部的做法略胜一筹。丛书类目的设立,说明他对不断涌现的丛书的重要性的认识有过人之处,此后如傅以礼《长恩阁书目》、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当代的诸多古籍目录均采用了“经史子集丛”的五部分类方法,进一步提升了丛书的地位。在认识发展过程中,将丛书作为二级类目置于集部之下是一个认识上的过渡。

5 分类体系划分的原则

编撰目录的过程,即作者利用个人对典籍性质和学术体系的认识,把次序散乱的典籍分门别类,使相连的书籍和类目具备内在关联的过程。就功用而言,私藏目录的编制,其一要网罗藏家之书,使人能够阅其书目而知藏书概况,达到因目寻书和因目知书的效果。其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图书编目反映学术、文化潮流变革。后者是更高层面的追求,需要编目者对古代学术发展和当代学术脉搏有

① 《葆醇堂藏书记》中《笠泽丛书》即入集部别集类。



更为全面和深刻的把握。藏书的实际状况和学术的发展变革是朱文藻划分体系、分类列目的主要原则。其编目一方面兼顾了登记、检索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清代的学术发展状况。

5.1 藏书的实际状况

朱氏从王杰藏书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设置类目以便于检索和利用,为了起到统计藏书的功用,他在每一小类后都列明该类别藏书的数量。朱氏在类目设置中,不拘泥于四部分类法,如藏书中无此部分书籍,则撤去相关类目,如经部未设“乐类”“孝经类”。若某部类仅有一种图书,常将其附于相近类目,而不再单独类,如将《衡湘稽古》附于志部通志类,纵横家类仅有《战国策》一部书,故不再设立,将书附列于子部道家。此外,调整部分二级类目的名称,如史部设立“谱牒”类,案语记:“诸簿录家史部分氏族、谱牒为二类。今以二事实相为因,无庸岐别^①,故并氏族于谱牒之中。诸儒年谱,生平事迹,分年编载,可与谱牒连累。”^[44]将氏族、谱牒、诸儒年谱等性质、编纂体裁相近的十种典籍不再分列而是并入“谱牒”类。再如史部设立“纲鉴”类,朱氏案曰:“《通鉴纲目》诸书皆编年体也,诸簿录家于史部有编年一类。今所藏者皆阐述涑水、紫阳而别无他书,故节取纲鉴二字,以标其目,不复仍编年之旧称。”^[45]此门类下“葆醇堂”所藏之书仅有《钦定资治通鉴纲目》《通鉴地理通释》等十余种,而无其他编年类典籍,因此朱文藻将“编年”改作“纲鉴”,综括阐释《资治通鉴》之书。必须要承认的是,因书籍种类不够全面和丰富而调整类目是相对无奈的选择,但在编目中若无此书却强设此目更显得牵强。朱氏在编目实践中不拘泥于既往框架,而是根据葆醇堂藏书的实际情况调整类目划分和类目名称,体现了变通和发展的观点,且能在类目变通时以案语阐明其渊源流变和变通的依据,其处理方式灵活创新又有根有据,从而弥补了某些因典籍缺收而调整类目的缺憾。

5.2 反映学术发展潮流

自唐至清,四部分类法沿袭千年,不能及时反映学术的变革,使得目录学与学术史产生了背离^[46]。在这期间,一些卓有见地的学者试图突破四部框架,郑樵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47],他的《通志·艺文略》就细分三级类目,分类达数百种,内涵广博;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采用十二分法^[48],也颇有新意。余嘉锡就用“欲论次群书,兼备众门,则宜仿郑樵、孙

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49]来肯定郑樵和孙星衍的做法。当然,在郑樵和孙星衍之间已有不少学者因时制宜,打破四部藩篱,李日刚《中国目录学》一书就列有叶盛《菴竹堂书目》、陆深《江东藏书目》、晁璠《宝文堂书目》、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沈节甫《玩易楼藏书目录》等“突出四部窠臼者十一家”^[50],并揭示了上述书目在分类上的创见和不足。此外,钱曾《读书敏求记》分七十八小类,王闻远《孝慈堂书目》分八十五小类,虽然略显“琐碎冗杂”,但对开阔视野不无益处。

就典籍的八分法而言,朱彝尊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曝书亭著录序》中表示将藏书分八类著录,“录凡八卷,分八门焉,曰经、曰艺、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类、曰说”^[51],但书未刊行,已经失传,故不知其分类依据;翁方纲在《李南涧墓表》中说李文藻“意欲依《曝书亭著录》八门之目以编经籍”^[52],亦未见其书;不过虽然如此,也可见他们认识到了四部分类法的局限。朱文藻《葆醇堂藏书录》一级类目之创设与朱彝尊相同^②,类目达到三级分类,且有案语揭示其分类缘由,其分类方法一方面建立在传统的四部分类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整合了诸小类新设艺部,并将志部、类部、说部提升为一级类目,且在二级类目的设置中也力求突破窠臼,重新认识类书的性质和丛书的价值,集中体现出对四部分类体系的改造和对古代典籍分类法的开拓。

“古籍目录素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

① 抄本作“岐别”,“岐”通“歧”。

② 《曝书亭著录》未刊不传,后李富孙曾予重编,李富孙序云:“竹垞先生好聚书,于是构书亭南以暴之,计得八万卷,先生尝欲编其著录,而迄未成,数十年,渐就散佚。”现存的朱彝尊书目著作如《曝书亭书目》《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曝书亭藏书集目偶存》等均未采用此八分法。朱文藻为朱彝尊同乡后学,尊崇其学,曾作《朱竹垞年谱》一卷,未知朱文藻《葆醇堂藏书录》一级类目之创设是否受到朱彝尊之启发,但朱文藻在案语中多云“诸家簿录”所设,意在创立标目,多有新意;且朱彝尊此序文未言及二、三级类目之设置办法,朱文藻之二、三级类目创设或为己见。见张宗友,朱彝尊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447;(清)许瑶光修,吴仰贤等纂.(光绪)《嘉兴府志》卷八十《经籍志》[G]//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志志辑):第14册.上海:上海书店,1993:606;朱彝尊,曝书亭书目[M].国家图书馆藏刘氏味经书屋抄本;朱彝尊,曝书亭序跋潜采堂宋元人集目录竹垞行笈书目[M].杜泽逊,崔晓新,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29-402.朱彝尊,曝书亭藏书集目偶存[G]//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第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这种功能是通过它的小序和部次分类体现出来的。”^[53]朱文藻对小学和金石学卓有专长,被《书目问答》之《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入小学家和金石学家^[54],他把六书、金石、韵书等类专门列出,别立艺部,不仅出于个人对该内容的重视,更是清代以文字音韵学、金石学等为代表的乾嘉学术勃兴的体现,反映了考据学的发展。《葆醇堂藏书录》金石法帖类共收书十种,其中就有六种为清人著作。类书部和丛书子目的设立一则适应了类书丛书大量涌现的现状,二则体现了朱氏对此类书籍性质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前人。志部之书按今天的学科划分属于地理类书籍,此前该部分典籍常收在史部,正如小学附在经部之末一般。从《隋书·经籍志》到《通志·艺文略》,再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始终作为史部的内容而存在。朱文藻在图书分类中将地理立为一部,使地理书拥有与史部书平行的关系,而不再统属于史部。这除了因王杰官任要职,故有了解各地形势的需要,地理类藏书很多,具备在书目中单独立目的条件外,更深层的原因还是清代诸多学者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多角度深研舆地之学,使地理类书籍逐渐增多,是清代经世致用学风的体现。此外,他对史部典要类、子部杂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的设立和顺序调整也都纳入了考证实用和学术变迁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因而可以说,为反映清代学术发展潮流而创新目录分类体系,是朱文藻变革类目的主要动力。

朱文藻《葆醇堂藏书录》幸存一抄本,使人得知其八分法体系,但其长期深锁书库,不为人所用,故其价值不为前人充分认识。是书灵活变通地部次群书,归纳学术,丰富了图书分类和学术总结的实践。通过其分类体系和简述学术源流、阐释分类缘由的案语,可以窥见乾嘉学人对学术演进的认识,也可以借此把握清代的学术潮流和风尚,其价值应该得到重视。

参考文献

- 1 郑天一.论文化环境、心理偏向与图书分类法——孙星衍十二分法产生的文化基因[J].图书馆杂志,2001(4):51-54.
- 2 汪诒年.汪穉卿先生传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21.
- 3 沈初等.浙江采集遗书总录[M].杜泽逊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851-852.
- 4 陈鸿森.朱文藻年谱[J].古典文献研究,2017(2):157-244.
- 5 周春.毫余诗话[G]//续修四库全书:第1700册:17.

- 6 胡敬.朗斋先生碧溪草堂诗集序[G]//胡敬.东里两先生诗.清道光二十五年崇雅堂刻本.
- 7 胡昌健.刘喜海年谱[J].文献,2000(2):136.
- 8 朱文藻.葆醇堂藏书录[G]//陈红彦.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志丛刊:第6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429.
- 9 同8:486.
- 10 同8:507.
- 11 同8:516.
- 12 同8:519.
- 13 朱文藻.葆醇堂藏书录[G]//陈红彦.国家图书馆藏稀见书目志丛刊:第7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75.
- 14 同13:76.
- 15 同13:241.
- 16 瞿世瑛.清吟阁书目[G]//林夕.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近代卷):第1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4.
- 17 柳燕.《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研究[D].上海:华中师范大学,2008:93-96.
- 18 孙星衍.孙氏祠堂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235-238.
- 19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17.
- 20 同13:25.
- 21 同13:98.
- 22 同13:350.
- 23 同13:105.
- 24 同19:1236.
- 25 范邦甸.天一阁书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01,308.
- 26 钱大昕.元史艺文志[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406,412.
- 27 同13:113.
- 28 朱文藻.校订存疑:卷8[M].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
- 29 同13:183.
- 30 同13:181-182.
- 31 同13:182-183.
- 32 同13:183.
- 33 同19:1222.
- 34 同13:241-242.
- 35 同13:40.
- 36 同5:17.
- 37 同16:12.
- 38 同28.
- 39 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M].上海:中西书局,2014:61.
- 40 辛德勇.研治古代文史的必备入门书籍——读黄永年先生著《古文献学四讲》[G]//黄永年.古文献学讲义.上海:中西书局,2014:318.
- 41 同13:216.
- 42 朱文藻.知不足斋丛书序[G]//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北京:中华书局,1999:7-8.
- 43 张衍田.四部文献学学术源流述略(十二)[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4):55-56.

(转第126页)